

中东剧变、影响及其应对

论以中关系的发展现状及其前景

[以色列] 谢爱伦

摘要：60余年来的以中关系历经波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色列就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因朝鲜战争与万隆会议等故使得以中关系趋于冷淡并中断。中美缓和、以埃媾和以及中越战争为中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香港开始成为中以军事、经济与政治合作的桥头堡，两国最终于1992年建交。由于以阿关系的反复、以色列对华武器出口中的美国压力以及中国内部的民族分离主义问题等因素，中国在以阿之间平衡取舍，影响其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成效。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社会普遍意识到中国的重要地位，以色列需要制定契合国际体系转型的对华新政策。

关键词：以中关系；以色列对华政策；军事与科技合作；中东和平进程；全球金融危机

作者简介：谢爱伦，博士，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执行校长，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肖尔·艾森伯格讲座教授（特拉维夫 69978）。

文章编号：1673-5161（2011）05-0008-06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一、六十年以中关系历史回顾^[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国民党政权便与犹太国家的创建者们建立了关系。这种关系在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之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并通过中国对锡安主义的积极支持而表现出来。除与锡安主义积极分子进行外交接触之外，当时的中国政府是10个在1947年联合国大会巴勒斯坦分治的历史性表决中投弃权票者之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色列于1950年1月9日做出承认新中国的决定，这成为冷战期间中东第一个和西方第七个做出如此大胆外交决定的国家。自此以后，以色列与中国台湾关系止于非官方、非政府并主要是商业层次上。

以色列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并未得到预期的效果，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承认收到了以色列1月9日的电报，并代表中国政府向以色列外长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表达了问候。

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7月2日，以色列内阁决定，以色列应支持联合国关于此次战争的决议，但本·古里安的派兵倡议被他的部长们否决了，后来以色列通过提供医疗援助和民事救援食品的形式向在朝鲜半岛的联合国军提供支持，结果造成了以色列与中国军队间接对抗的局面。

但是，以中其他领域的接触依然存在，特别是1950年9月19日，以色列代表团在联合国大

会投票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中国在该组织的席位。因此动机，以色列加入了 15 个成员国组成的集团，旨在达成促进新中国获得合法地位的目标。除了 1954 年（这归结于阿巴·埃班与夏里特之间的个人分歧和误解），以色列在联合国的代表团已持续数年支持北京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获得中国席位的合法权利。以色列紧随如印度之类的国家，将支持美国的朝鲜政策与基本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利的政策明确区分开来。1953~1955 年是以中关系的关键年份。1953 年底，随着以色列在缅甸仰光开设代表处以及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缓和，中国驻仰光大使姚仲明与以色列外交官大卫·哈科恩（David Hacohen）进行了接触。哈科恩相信他在仰光的存在将使他处在一个帮助以色列与亚洲国家尤其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的位置上，尤其在促进两国贸易问题上，两位大使之间的对话逐渐变得领域宽广且具有实际性和建设性，他们关于经济与商业合作意见的卓有成效的交流越来越明朗。1955 年 1 月底，以色列向中国派出了首个商务代表团，访问了沈阳并与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了重要会谈。

1955 年 4 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促进了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埃及）间更加紧密的关系，使得以中关系进入停滞时期。一年以后，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以中关系从此被冻结了很长时间，无关系时代开始了。与此同时，以色列决策制定者很难忽视以色列驻美大使阿巴·埃班（Abba Eban）的警告。埃班声称，哈科恩所倡导的以色列进一步公正对待中国的政策将无可挽回地损害以美关系。在对此问题进行深入辩论之后，内阁因赞成西方（美国）对中国的立场而否决了哈科恩“平等相待”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由冷战的氛围促成。以色列一直珍视的外交自由和事实上的不结盟外交政策，轻而易举地破灭了。从此以后在以色列激起了关于“失去的机会”的激烈的政治与外交争论，一直持续到 1992 年以后，那年以色列和中国同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

无论是 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还是 1967 年的“六日战争”，看不到以中关系任何有迹可寻的进展。与此相反，这十年来只看到中国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在 1979 年中国与越南的边界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因其无法有效驱逐越南军队而开始寻求军事和技术援助，以色列是少数几个能满足中国紧急军需的国家之一，国际性犹太商人和企业家肖尔·艾森伯格（Shoul N. Eisenberg）——作为以色列军事工业与中国之间享有专属特权的中间人——扮演了实质性的角色。^①在两国涉及武器的军事合作中，以色列为中方提供了升级版的最初由苏联设计的 T-59 坦克^②，推动了以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1977 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1979 年，以埃签订和约。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中关系的稳中上升。1989~1991 年期间，中国在特拉维夫开办了旅行社，以色列在北京开设了学术代表处。^③

二、1992 年以来的以中双边关系

以色列与中国在 1992 年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在北京和特拉维夫分别设立大使馆以后，双边经贸关系得到了发展，以色列将高科技、化工、通讯、医疗光学和农业等领域的科技出口到中国，以中贸易（中国对以出口约占 3/4）在 2006 年大幅攀升，达到约 38 亿美元。2008 年，该数字达到 55.3 亿美元（包括钻石），使中国在以色列的贸易伙伴中上升到一个重要地位。尽管受到

① 1987 年，以色列政府决定促成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阿摩司·犹丹（Amos Yudan）被指派通过在香港建立一家名为 COPECO 的贸易公司来处理该事务。这个公司对于未来两国商业关系的建立极有帮助。

② T-59 是无处不在的苏联 T54A 坦克的中国版本，直到 2000 年它一直是中国军队的主干坦克。

③ 该机构由约瑟夫·沙赫维特（Joseph Shalhevet）教授领导（1990 年获得任命）。1992 年，当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他担任了以色列的文化参赞。鲁文·默拉夫（Reuven Merrhav）领导的以色列驻香港总领事馆为中以外交关系的建立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双边贸易下降了17%（约45亿美元，包括钻石），但2010年快速复苏，上升了48%，达67.8亿美元。2010年，以色列的进口总额达47亿美元，以色列向中国的出口为20亿美元（与2009年比上升了92%）。^④在冷战期间的20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据其他观察家的数据，以色列对中国的军火销售额达到30~40亿美元。在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施压的前提下，这些数字不可能再继续。^⑤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兴趣不再仅限于军备，而是期望能够获取以色列的先进技术，尤其在农业、电信和防务等领域。以色列的“全球环境解决方案有限公司”（GES）参与到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价值500万美元的水净化工程之中。中国还对太阳能技术特别感兴趣。以色列最大的对华出口项目是高科技，许多公司已进入中国市场。

中以文化关系中停滞甚至倒退后出现了改善迹象：以色列爱乐乐团1995年访问北京和以色列博物馆在2001年举办长达4个月的中国展品展览。这次展览在专程从中国借展的原始展品数量上史无前例。在此次展览会场，举办了包括歌剧、杂技、舞蹈和其他各种传统活动的艺术节。

此外，两国的教育和学术交往也日趋频繁。中国留学生在以色列不同的大学里学习并从事不同领域的研究。如在特拉维夫大学的孔子学院，不仅积极参与学术研究，而且向包括在校学生、教授等讲授汉语知识。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学生前往中国并在不同省份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甚至中医等知识。两国以及它们各自的学术机构之间的各种交换项目也证明是富有建设性和成效性的。毫无疑问，在官民两个层面上，以中两国民众之间的友好交往正在全面开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书籍，主要是小说和经典哲学译著已被介绍给以色列读者；关于犹太教、犹太史及现代以色列文学等著作也被译成汉语并介绍道中国。中国互联网站对于以色列以及阿以冲突的关注也日趋普遍。

自2011年以来，以中涉及国防和安全事务的关系获得了相对的提升。6月12~16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访华，这是10余年来以防长的首次访问，是以中关系2000年以来的重要突破。2011年8月4日，中国的陈炳德总参谋长抵达以色列，会见了佩雷斯总统、内塔尼亚胡总理、国防部长巴拉克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本尼·甘茨（Benny Gantz）。^[2]

三、中国、巴勒斯坦乃至中东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期望在全世界不同冲突领域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当然也包括致力于推进中东和平进程。中国外长杨洁篪在2009年4月底访问以色列时呼吁重启以巴和谈并呼吁中东和平进程取得进步。杨洁篪在会见巴勒斯坦阿巴斯主席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请有关各方采取积极的建立信任的措施来稳定局势，并为以巴和谈的恢复开辟道路”。他还为更广泛的冲突议题提供深入的视角：“我们希望看到以巴和谈早日恢复；与此同时，我们也乐见以黎、以叙和谈尽可能开展。”^[3]杨洁篪在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时重申了中国的基本立场，并指出中国准备为促进以巴和谈提供帮助，中国确实希望在中东问题的解决中扮演建设性的角色。内塔尼亚胡向杨洁篪陈述以色列的立场，声称以色列政府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并打算扩大双边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⑥杨洁篪部长还在此次中东之行中提出促进中东和平进程的五点建议：

^④ 参见以色列驻华大使馆贸易代表2008年8月和2009年3月发给笔者的材料，网址：<http://www.israeltrade.org.cn>；<http://www.tamas.gov.il> and memoranda.

^⑤ 据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研究所（Israel Expor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stitute）的资料：事实上，中以贸易额2009年1~4月间比2008年同期下降了18%。

^⑥ 参阅《中国日报》和http://www.mp3-mp4-ipod.cn/china/2009-04/24/content_7711957.htm 与 <http://www.china-un.ch/eng/xwtd/t558942.htm>。

1. 有关各方应坚持和谈的大方向，以联合国有关决议、“土地换和平”原则、“路线图”计划、“阿拉伯和平倡议”为基础，坚定推进和谈进程。2. 各方应采取积极措施，尽快恢复局势稳定，不断积累互信，为和平进程向前发展创造条件。3. 要坚持“两国方案”，早日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实现巴以“两个国家”和睦相处。这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出路，也是中东和平与安全的根本保障。4. 国际社会应持续关注中东问题，为各线和谈以及巴内部分团结和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5. 巴以、叙以、黎以等各线谈判应协调推进，以实现中东地区的全面和平。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继续同有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为推动中东问题的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4]

尽管有这些声明以及中东问题特使的存在，中国在中东问题的参与却仍受限，美国等有关四方^①（Quartet）依旧是中东和平问题的主角。看起来以色列的主要挑战是促进中国外交官推进或至少是更好地理解以色列的外交议程。中国默认的立场是在很大程度上支持阿拉伯，这基于它的能源利益及其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传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中国从中东的石油进口从 20 世纪九十年代的 115 万吨上升到 2004 年的 4500 万吨。2005 年，中国从中东的石油进口额占其石油进口总额的 58%，其中 13.6%来自伊朗。自从 2008 年秋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从中东的石油进口额下降。中国政府转向其他国家以确保其能源供应安全之后，中国从该地区石油进口额占其海外石油进口总额的比例在 2007 年跌至 40%。^②但对于中东石油的依赖度看起来仍然很大，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力量将越来越依赖于获得中东巨大的石油供应。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许多中东和非洲的向中国出售石油和石油开采权的国家是中国武器的买主。武器销售为中国在该地区赢得立足点提供了机会，并有可能在战略上发展长期联系以确保其不断增长的能源利益。^[5]

四、中国、以色列与香港特区

以色列与香港这个在 1997 年 7 月回归中国后所建立的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也与以中关系存在关联。多年来，香港是以色列在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以前的英国殖民政府提供了直接与间接出口的市场以及重要的进口来源。当以色列 1973 年在香港设立了总领事馆时，它期望促进即将到来的以中友好关系。但由于以色列财政预算减少，香港总领事馆被撤销，领事办公室在一名当地犹太商人作为名誉领事的领导下保持运作。

1984 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发表以及以中关系的改善之需均为促进以中交流提供了进一步的契机。1985 年以色列在香港重开总领事馆，充当了以色列开展对华外交的前哨，香港也迅速成为以中官方和非官方代表的重要交往桥梁，并使得香港成为以色列商人、学者和游客前往中国的便捷渠道。

以中在 1992 年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之后，香港的作用自然被限定为两国联系桥梁的角色，如今这个前殖民地的总领事馆也扮演了更多传统的领事角色。

五、国际视野下的以中关系

冷战结束以后，司空见惯的事实是：两极国际体系不再存在，且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保持了几乎 20 年之久的难以撼动的霸权地位。主流观念看起来并未考虑中国的“和平崛起”——这在当前

^② 即联合国、美国、欧盟与俄罗斯四方。

^③ 更多关于此类信息请参阅《中国日报》，<http://www.chinadaily.com.cn>。

金融危机之前尤为明显。和平崛起的内涵是什么？

近年来，中国对于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战略方向进行了重大的政策辩论。在报纸、杂志和内参中，中国官员和学者讨论了中国如何将其巨大的经济成就转换到新的国际政治领域的战略选择等问题。事实上，“和平崛起”则是中国对于即将崛起力量相关的历史问题的思考方式，也是中国对于许多世界对手经常提及的臭名昭著的“中国威胁论”的延迟应对的类似心态。因此，作为以色列的大战略而言，中国的经济—金融能力以及有形的全球外交战略崛起的前景，应该会引发对于未来全球定位优先选项的认真思考。虽然这与当下或不久的将来关系甚少，但应为长远规划而采取一些大胆的措施，如在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理府开展与学者和其他专家的常规性高层次磋商。此类磋商的基本前提应是公开、坦诚的审议并欢迎非传统意见。

有许多其他的全球问题也与以中关系相关联，尽管是间接的，如中国寻求与亚洲、欧洲、中亚、南美、非洲、加拿大和其他美国盟友之间的科技合作乃至多边安全协定，对于以色列或以中关系甚少直接影响，只有这些反响在中东被感受到以后，这些问题才会变得对以色列日趋紧迫。

假如中国在世界性经济衰退末期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再度增大，它将重新引起华盛顿的深虑，并引向一个即便不是历史性但一定是危险性的十字路口，这给以色列和中东带来了涟漪效应。从历史的眼光看，两个对抗力量之间仅仅是寻求生存空间或为生存而战的冲突，往往导致不幸的后果。正如在朝鲜战争的关键时刻，以色列定会发现其身处长远影响的情势之中。

六、以中关系前景展望

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以色列外交部因预算缩减而被迫关闭在香港和韩国的外交机构。在这段时间里，以色列以欧洲为中心的外交倾向十分强烈，任命驻巴黎的又一外交官或驻纽约的领事看起来比维持在新兴东亚国家的使团更为要紧。如今事态的发展则完全不同，2009年3月，以色列在广州设立了总领事馆，其目的在于加强以色列与中国四个东南省份之间的合作，广东、广西、福建和海南四省共拥有2.2亿人口，是以色列人口的30倍。

以色列采取了许多措施，如提升在农业和用于和平目的的技术领域的合作，促进中国人前往以色列旅游，以使中以贸易额两倍甚至多倍地增长。

综上所述，尽管存在着诸多限制，以中两国仍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进一步促进以中关系并使以色列从两国的密切关系中受益。以色列应尝试并逐渐采取替代性的谨慎的对华新政策，其决策者须将新兴的全球情势予以内化吸收，尤其可能的情况是，即国际舞台上不再是一个霸权国家，而会两到三个。事实上，在这个新兴的两极或三极世界中，中国将成为一个主要行为体。鉴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以色列应该做到：

第一，重新评估其总的对华外交政策。以色列能够确实期待对华民用产品与技术出口的增长，但重启军事材料出口还不可能——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甚至军民两用的产品出口也处于困境之中。

第二，采取认真的审查措施以确定是否所有的适当努力都被用来增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第三，取消与对华贸易有关的一些行政阻碍性因素。

第四，采取具体措施以促进亲以情绪在中国知识界和广大民众中的进一步扩大，要面向潜在的年轻有为的青年精英，他们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国家和地方领导岗位上的储备力量。

第五，寻求与中国在农业和科学等“中间”领域的进一步深化合作。

第六，加强与中国有关各方非政府的学术与研究领域人员的接触与联络。

第七，以色列政府应采取不同的方法以寻求在以色列—中国—美国三角关系中获得平衡。
第八，与驻联合国总部的中国外交官开展更加深入和密切的交往与合作。
国际舞台上已出现平静而巨大的转型，以色列的决策者应小心面对而不能将其忽视。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钮松博士译介）

[参考文献]

- [1] Aron Shai. China and Israel – Strange Bedfellows 1948-2006 [M].// Simon Shen, ed., China and Antiterrorism. New NY: Nova Science Pub Inc., 2007.
- [2] Yaakov Katz. Chinese Army Chief Due in Israel Next Week [N]. *Jerusalem Post*, 2011-08-08.
- [3] Xinhua News. [EB/OL].[2011-06-14].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9-04/23/content_11238582.htm.
- [4] Foreign Minister Yang Jiechi Makes Five-point Proposal to Promote Mideast Peace Process. [EB/OL].[2011-06-14]. <http://www.mfa.gov.cn/eng/wjb/wjbz/2467/t559690.htm>.
- [5] William Pentland. Did the US invade Iraq to contain China? [EB/OL].[2011-01-07]. <http://www.forbes.com/sites/williampentland/2011/01/07/did-the-u-s-invade-iraq-to-contain-china/>.

Sino-Israeli Relations: Current Reality and Future Prospects

Aron SHAI

Abstract More than 60 years' Sino-Israeli relations experience twists and turns. One year after the founding of State of Israe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established, Israel turned to the new regime, but the Korean War and the Bandung Conference ma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rael and China become cool and eventually break. The ease of Sino-US relations, Israel-Egypt peace talks and Sino-Vietnam border war provide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ino-Israeli relations again, and Hong Kong became the bridgehead of dual milita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operation; the two countries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92 eventually. Due to the change of Israel-Arab relations, the American pressure on Israeli arms exports to China and China's internal ethnic separatism, China swifts between Israel and Islam-Arab countries with limited success in the involvement in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In the current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cognizes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China, Israel needs new China policy which fits the era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Israel-Sino Relations; Israel's China Policy; Military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责任编辑：李 意）